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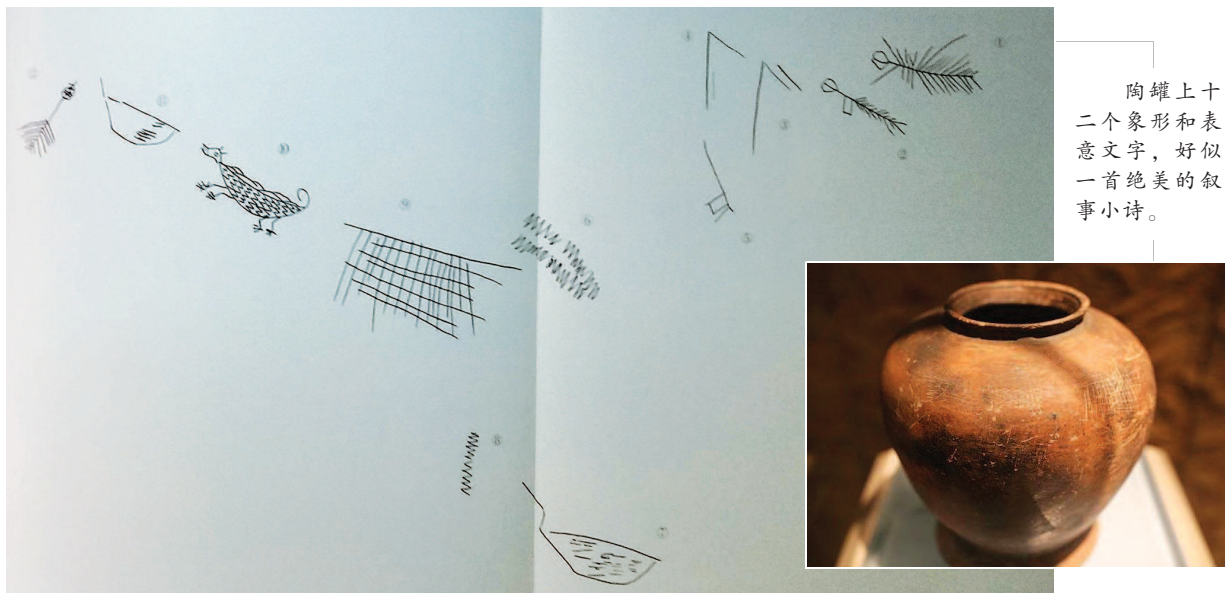
学林

名家谈学术

良渚陶文：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书写

李铁华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80年来余把这八个字当作一句俚语，从未引起过足够的重视。前几日携友去了一趟良渚博物馆，偶然在接待大厅看到了一册《良渚文化刻画符号》，打开一看，竟然有不少古文字映入眼帘，有象形文字，更多的是表意文字。作为一个从事古文字研究几十年的学人，余立马从相应的殷商甲骨文中找到了部分同形文字。诚然陶器上的确存在着数量不少且介乎装饰图案的“符号”，令人不知所以。回到居所，余再次像当年研究被康有为称为中国第一文物的《石鼓文》一样，走火入魔，夜不能寐，结果是意想不到的惊喜，余终于明白杭州为什么被誉为人间天堂。因为，从五千年前的良渚陶文上可以看到天堂里文明的灿烂曙光。我深感责任重大，很有必要把良渚陶文的重大意义写出来，告诉世人，共沐荣光。



陶罐上二十个象形和表意文字，好似一首绝美的叙事小诗。

内容丰富的良渚陶文

良渚陶文中有不少象形文字，日月星辰、山水飞禽、鸡龟猫蝶鹿蛇更是栩栩如生，一目了然。一个“燕”字，写的就是一只燕子，线条流畅，与甲骨文燕字同形；“星”字，与国旗的五角星同形，无疑可以看作五千年文明的传承；江南水乡常见的鱼笱对应的文字形似一只竹筐，这是一种鱼能游进去而再也出不来的竹制鱼具，亦即《诗经·小雅·蓺之华》“辨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中的“罍”字。陶文中的象形文字，其实也有丰富的内涵。比如：羊，表示吉祥；鱼，表示富裕；草木，表示丰盛和茁壮成长。早期陶文中的确存在大量符号，也代表着一定的含义。有些文字学者，把所有初文都说成符号，不承认其为文字的初形就有失偏颇了。

陶文中还有不少数筹，一横为一，二横为二；三四亦然……南湖出土的一个陶罐上，一下子出现了22条横画，这无疑是表示一共制作了22件陶罐。这种方式显然有点笨拙，陶工们很快就改I为十；II为二……万作卅。这个“万”字不简单，全世界不少地方均有发现。唐武则天将卅定音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足见这位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水平着实不一般。其实在商周时期，万、万、卅三文已经互通借。可以这样说，数字完全是从生活需要出发形成的完整的记数文字。

除了象形和数筹，良渚陶文中更多的是表意文字，计有丁、又、示、

木、中、亚、田、今、有、已、爻、左、月、夕、入、小、玉、王、本、人、川、狂、彤、甲、公、亚、生、刀、戍、厂、未、雨、才、上、下、卜、乙、井、甘、卯、在、等。有一个字形与甲骨文同，当为禘字，意为祭祀。

除了单字，良渚陶文中还出现多字现象。苏州澄湖的一个黑皮陶罐上，排列着猫鸟蝶鸡蛇五个象形陶文，线条流畅，美不胜收。在另一个贯耳壶的腹部，有一组文字，饶宗颐释为“雋戩五个”。雋，古时作官室深密处解，于文句不合，故第一字当误。按《说文》：“雋，交接材也，象对交之形。”此说颇有意思，陶文第一字确有交接与对交之形，然非雋字，当释“箏”，正是良渚曾出土的竹制蒸架，是一种交接而成的生活用具。戩即戩，斧形，制箏之工具。箏字右边尚有长长的一横画，表示此箏“一下子”用钺做了五个。可见刻文为记的陶工，不仅心灵手巧，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中国文字正是由一大批这样的聪明之人创造，然后互相渗透，兼收并蓄，逐渐形成。良渚南湖的一个夹沙黑皮陶罐腹部处，刻了一周十二个象形和表意文字，余越看越喜欢，觉得这好似一首绝美的叙事小诗。兴之所至，欣然命笔，书写出来，与读者诸君共赏。

手持弓矢去狩猎，(前三个象形文字为弓矢弩)
无果而返回水乡。
大网小网全带上，(三个网形文字及一小池塘)
满载而归喜洋洋。
用钺制鱼下陶罐，(三个表意文字，钺和下字)

鱼鲜饭满屋香。
耀眼鱼刺兴未尽，(最后二个象形文字为鱼骨)
刻此以纪陶罐上。

按，余之所以说狩猎无果而返的依据是，餐桌上只有鱼刺而无鱼骨。这次会餐，皆大欢喜，故特地刻在罐上以为纪念。这也说明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不仅生活得很滋润，作者也是个有文化有情趣的好客之人。

五千年前的良渚，位于环大湖流域的西南部，这里气候湿润，资源丰富，水网密布，特别适合人居。这里不仅有过官殿式的豪华建筑，又有相当完善的水利设施，甚至还出土了贮存着20多万斤稻米的大型粮仓。既有锦片，又有麻织品。大量陶器纺轮的发现，说明当时纺织业已具有相当规模。五千年前，当世界上的多数先民还在以树叶遮盖，兽皮取暖的时候，良渚先民已经吃着美味鱼鲜配香喷喷的米饭，穿着华丽的锦衣，行走在宽阔的街市，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天堂就绝非虚言之说了。因此，先民们在文明之路上先行一步是绝对可信的。

比甲骨文还早的文字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仅收了600余个“符号”，而今“符号”已征集到近千个，目前正在整理之中。余期待着一睹为快，并做进一步的研究。但仅凭眼前的资料，余以为良渚文化已经有固定的书写方法，而且已为长三角地区的上海马桥文化和苏州澄湖文化，以及浙江余姚

以见到中华民族的几百个姓氏，足见陶文是我国文字发展的活字典。

陶文中有20个字母

余在研究良渚陶文的同时，尚有一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五千年前的陶文中竟然藏着19个拉丁字母。按罗马文以字母“十”为“K”。这样算来，良渚陶文中就有20个字母，约为世界通用26个字母的80%。兹将这些字母公布如下：A、D、C、E、U、Y、P、I、S、W、N、V、L、H、T、X、M、O、Q、K。除了良渚文化出现字母外，大溪地文化彩陶上有X、I、O、十(K)四个；二里地陶文中有X、I、V、M四个；半坡文化陶器上则有T、J、Z、E、K、L、P、V、X、O等十个字母。这说明我国先民有用过拼音的方式来解决语言向文字发展的尝试。众所周知，拉丁字母源自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则源自腓尼基字母。罗马字母又继承了希腊字母，26个字母也就成为现代英语的字母。美国学者吉德伟在谈到汉字起源的论文中，认为西方传教士很早就将字母传入华夏，但始终无法引导汉字“字母化”。他同时又指出，汉字传承精英文化，蕴积至为深厚，因此不受西方影响。余认为，他要是知道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中已经出现了20个字母，会否发出，中国陶文中的大量字母，在与外界交往中互相渗透，才促成西方字母的发展这般感叹。饶宗颐认为：“陶符与腓尼基字母比较，百分之七十以上实同于汉土仰韶期彩陶上的符号，这说明很可能远古时期，西北地区的闪族与羌人杂处，通过商品贸易，闪族人遂取陶符作为字母依据的材料。”他又引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倡言之“陶瓷之路”说：“我则认为彩陶文化时代，陶符的交流借镜，引出字母的发明，在人类文化史上更有重大的意义。陶符之被采用作为字母的形符，是陶瓷之路文化交流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按说，生活在这些先民，凭借水系之便，很早就开始对外通商，五代吴越国甚至还到过阿拉伯进行海外贸易，文字上的交流亦属正常。至于良渚先民创造的字母，如果对世界文明带去过实质性的帮助，那应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本文不想赘述，留待国内外有识之士去继续研究吧。

余非常庆幸的是先民们放弃字母，而是走了由象形、表意到形声这样一条文字发展的道路，厥功至伟哉。

(作者为古文字学者)

陈望道与复旦修辞学研究

濮之珍



2020年是陈望道先生进入复旦大学从事修辞教学、研究100周年。复旦的修辞学研究在望老的教育、带领下，逐步走上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望老的《修辞学发凡》被公认为现代修辞学的重要里程碑。但他1977年仙逝后，复旦的修辞学研究能否继承与发扬他的修辞学研究，不断开辟新领域、延续辉煌？这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望老的学生宗廷虎、陈光磊、李熙宗等带领的修辞学团队，40多年来，对望老的修辞学理论加以开拓、创新，对语体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推进。就“史”的研究来说，宗、陈两位用力尤多。前二十几年，宗、陈率领的团队主攻的是“中国修辞学史”；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主攻的则是“中国修辞史”，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年他们准备先对中国修辞史领域的新开拓编写一本《中国修辞史论》。

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是望老创建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修辞组的指导老师，对指导与带领他们学习望老的修辞学研究起了一些作用。回想1955年语言研究室刚成立时，曾约请了一批兼职教师，我记得有郭绍虞、吴文祺、李振麟、胡树树等老师，校外还有周有光、倪海曙老师，现都已作古。我当时只有30多岁，今年已98岁高龄。作为历史见证者，为望老修辞学研究的继承、发展以及望老精心培养青年学生的事迹，提供旁证资料，也是义不容辞的。

这部《史论》之编，是对20年来复旦修辞学研究团队有关三种中国修辞史著作的回顾和总结。即：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三基本)、宗廷虎、李金苓的《中国集句史》、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辞格审美史》(五基本)。它们是不同层次、不同视角的中国修辞史，也是在望老影响下三个领域中的“第一部著作”。如《中国修辞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今今来的修辞现象演变史；《中国集句史》是我国第一本专门梳理“集句”现象的修辞史；《中国辞格审美史》是我国第一部将修辞学与美学互动交融探索的修辞史。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继承与发展了望道先生修辞学研究，持续创新，对中国修辞史研究作出了多角度的开拓。

从1920年望老应聘来复旦大学任教，开设修辞学课程，陈望道修辞学研究由孕育、课程到发展、并延伸至今，恰巧一百年。百年间，复旦大学的修辞学研究对全国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大约有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30年代：望老的里程碑著作《修辞学发凡》问世；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望老的一批文章与演讲对我国的修辞理论作了深入探索，开拓了修辞学理论的新境界；三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宗廷虎、陈光磊、李熙宗带领的复旦修辞学团队，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成果开拓了我国修辞学研究的新时代，在语体风格研究上也有了新进展；四是新世纪头20年：宗廷虎、陈光磊带领的团队，又以多角度、多层次的系列成果，对我国修辞史这一新领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正如《修辞学发凡》早就教导过的“修辞学的述说，即使切实到了极点，美备到了极点，也不过从空前的大例，指出空前的条理来，作诸多后来居上者的参考。要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提出新例证”，指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当代我国修辞学蓬勃发展的现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实望老的一生，对语言学的多个领域，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望老一系列创新理念、创新道路和方法，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学理论。若能按语言学学科如语法、语音、词汇、语言学、语言学史等多领域所吸取，也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语文学会前会长，第一届上海市语言学研究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学人笔谈

关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思考

方松华

学术史是人类思想的伟大灵魂，其既是人类优秀文明的传承与记录，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历史与写照。我们之所以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百年学术史”如此宏大的主题，乃是从学术史的视角检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并进一步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建构、“话语体系的建立”、“学科体系的建构”、“国际视野的比较”四个方面来建构一个原创的、完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

学术系统的建构

近百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从“问题与主义讨论”、“唯物辩证法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直到绵延近一个世纪的“东西文化论战”，从学术论战的角度而言，正是在与各种思潮的相争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逐渐成为主流话语。

从学理方面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引领现代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学说，需要深入的历史与逻辑的建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一个重大任务。学术史在中国传统中有着“道(原理)与术(运用)”的意蕴，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只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思想范畴与逻辑发展，厘清、阐释乃至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是本研究的使命。

话语体系的建立

在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套中国的话语系统。从“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哲学式阐发，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中国话语表达形式，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潮。因此，发掘和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是我们建构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形式的表达，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内涵的彰显。

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虽然近百年各种学术思潮兴盛，但是大多匆匆而过，深度明显不够。一方面是因为学术思想的原创性不足，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外，在学术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方面，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中国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在学术话语的思想内涵的建构方面，还存在很大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大多是模仿或引进西方模式，就以哲学为例，“哲学”这一学科从名称到范畴再到体系，无不烙有西方哲学模式和方法的印记，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即是由此起。诸多现代中国哲学家曾经非常努力地试图建构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可惜大多没有成功，其原因也是在于没有确立中国本土的话语体系。因此，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仅

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科体系的建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旨在探索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创新中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其中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艾思奇、冯契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何其芳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方面，孙冶方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发展作出了新的成绩。这些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成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共同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这个时代的巨大主题。

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构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回顾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构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时期，改革开放前后有不同的特征。在此，我们将突出地研究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学科之间的关系所经历过的四个重要发展阶段：其一是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尚处于初创阶段的各个具体学科门类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完全、不平衡和竞争与引领相结合的特征；其二是中国成立后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一方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各

具体学科的指导性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各个具体学科门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并且在力图批判地脱离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支配性影响下的学科体系或知识建构逐渐淡出甚至解体，大规模引进和移植现代西方学科体系，马克思主义被设定为基础性的学科门类，引领并与其他学科共同发展；其四是新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启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设立为国家一级学科，各大院校和科研单位也纷纷设立或恢复了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科研院所，极大地推动和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步伐。

国际视野的比较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与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所结下的丰硕果实。由国际视野来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能够拓展和丰富研究领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而且在当下的实践中正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从国际视野来考察，在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破解“历史终结论”的，它将开启的是不是人类发展的新的途径和现代文明样式？此外，由国际视野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

史，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学说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可以从外部世界、另一个角度来探索并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

社会意义与学术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史建构的根本主旨就是要在经验、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学术积累和学术发掘的意义上，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史建构可以在发掘学术资源的层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兴衰成败与党的理论创新能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创造力有着本质性的关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史建构可以为提升党的理论境界和理论水平，增强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厚植坚实思想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创一种新型的文明和社会类型的可能性(如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百年学术史建构，可以揭示出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破解“历史终结论”、为人类社会开辟了新的未来和历史远景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